

# 克宮易主及其政策趨向

畢英賢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病故，距前任總書記安德洛波夫去世祇有十三個月；距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布里茲涅夫之死也不過二十八個月。在短短兩年多之內，蘇聯三名領袖相繼死於任上，不但是蘇聯歷史上罕見的事件，在世界各國政治史上也屬少見。

契爾年科去世的次日，蘇共召開緊急中央全會。會中葛羅米科(A. A. Gromyko)提名戈爾巴喬夫(M. S. Gorbachev)繼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全會一致通過」。總書記是蘇聯政治體系中的實際掌權者，因此戈爾巴喬夫平步青雲，從此就是克里姆林宮的「新沙皇」。蘇共總書記的任期無明文規定，以往的總書記大多死於任上，祇有赫魯雪夫例外；而戈爾巴喬夫祇有五十四歲，來日方長。因此，他的上臺被視為蘇聯另一個朝代的開始，而安德洛波夫與契爾年科祇是過渡性領袖。

值此歷史的轉折時期，似應對契爾年科短命統治作一個交代，同時對戈爾巴喬夫作進一步的認識，進而對蘇聯今後的政局與政策趨向作出初步的蠡測。

## 對契爾年科蓋棺論定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契爾年科在他的前任安德洛波夫逝世後，當選蘇聯共黨總書記，開始了充當蘇聯元首的短暫生涯。契爾年科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於西伯利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Krasnoyarsky Kray)的農民家庭，早年在富農家當僱工。他十八歲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二十歲參加蘇聯共產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領導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共青團諾夫賽羅夫斯基(Novoselovsky)區委會宣傳鼓動組。一九三〇年，他加入紅軍，曾在邊防軍服務，任邊防卡哨黨組織的書記

。契爾年科退伍後，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工作，先後擔任諾伏賽羅夫斯克及烏雅爾斯克區黨委會宣傳鼓動組組長，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共黨教育之家」的主任、黨委會宣傳鼓動部副部長、書記。一九四三年，進入「共黨組織者高級學校」就讀；一九四五年畢業後，任平札（Penzensky）省黨委員書記；從一九四八年起，任莫爾達維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鼓動部部長①。在這段時期內，布里茲涅夫任莫爾達維亞黨第一書記。因此，契爾年科的宦途也到了轉捩點。

一九五六年，契爾年科被調到莫斯科，任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羣衆處鼓動處處長，兼任「鼓動者」雜誌編輯委員會委員。從此，他步步追隨布里茲涅夫之後。一九六〇年，契爾年科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書記長。一九六〇年布里茲涅夫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時，契爾年科是他的主要助手。一九六四年，布里茲涅夫鬪倒赫魯雪夫後繼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一九六六年時恢復「總書記」稱呼），契爾年科於一九六五年就被調到蘇共中央，任總務部部長。這個職位使契爾年科掌握蘇共中央人事大權，從容安排親信。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一年，任蘇共中央候補委員；一九七一年成爲正式委員，一九七六年任中央書記，一九七七年被選爲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七八年升任正式委員。

在七十年代中期，當布里茲涅夫病老力衰之際，原屬意基里林科（A.P. Kirilenko）爲其繼任人，後來兩人因政策上意見相左，於是布里茲涅夫開始物色另一個繼承人，其條件是，這個被提升的人不致立即威脅他自己的地位②。於是，他在政治局以外選中了契爾年科，使他三級跳，在短期內升爲政治局委員。在此之前，契爾年科在國際上還是默默無聞。可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布里茲涅夫去世後，契爾年科依然屈居第二把交椅，受制於安德洛波夫。安德洛波夫任總書記期間，契爾年科的聲勢黯然失色，一度未曾公開露面。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安德洛波夫辭世，四天後，年已七十二歲的契爾年科當選蘇共總書記，成爲擔任此一職位年齡最大的人。

契爾年科主政僅十三個月，數度臥病，因此欲總結他的政績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更何況蘇共決策過程與實際政治運作的情形鮮爲外界所知。以下，先根據契爾年科死後蘇共所發表的文件③，歸納其「政績」於後，其中雖多溢美之詞，但亦可代表蘇共給他的「論定」。

(丁)他一生爲黨及蘇聯人民利益工作，努力實現蘇共政策，尤其是實踐二十六大的決議。

註① 「契爾年科生平」，《真理報》（*Pravda*），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第一页。

註② 賽姆士（D.K. Simes），「康斯坦欽·契爾年科」，《基督教箴言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六日，第十四頁。

註③ 這些文件包括，「契爾年科生平」、「蘇共中央全會公報」、「告共黨及全蘇人民書」等，見《真理報》、《消息報》等，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十三日。

(二)一九八三年以來，他歷次的報告與演說，使蘇共的戰略方針獲得多方面的論證，特別是使「已發達社會主義」概念更加深刻與具體化，這個概念正是蘇共擬訂未來新黨綱的理論基礎④。

(三)契爾年科領導期間，非常「重視」改進羣衆思想教育的形式與方法及黨的組織工作，改進幹部政策，改良各級蘇維埃、職工會與共青團、創作聯盟、人民檢查機關的活動，對教育改革盡力頗多。

(四)他非常「關心」社會生產成長速度的提高、經濟全面集約化、科技加速進步、完善經濟結構、加強紀律與組織。他在去年十月全會的報告中，使蘇共的農業政策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並確定了實踐「糧食綱領」的迫切任務⑤。

(五)在國防上，他加強了防衛力，提高了蘇聯武裝力量的戰備；在外交上，實現了蘇共的對外政策：鞏固和平與國際安全，抑制軍備競賽，防止核子戰略威脅。

(六)契爾年科頗注意發展與加強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合作與團結，一貫支持世界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並加強其團結，同時支持民族解放運動。

以上所列，與其說是契爾年科的政績，毋寧說是其政治目標與理想，其中已經有成效或結果者不多。所以，他對蘇聯的「貢獻」理論多於實踐。事實上，在他任期内，蘇聯國內方針不穩，對外政策搖擺不定。他是蘇共歷來健康狀況最差、權力最弱的一名領袖；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和權力創造自己的「殊勳」。

## 戈爾巴喬夫的生平與性格

一九八四年二月，契爾年科剛就任總書記，國際輿論立即把注意力投向戈爾巴喬夫，認定他是蘇聯未來的領袖，甚至東歐集團也持此觀點⑥。同年四月，蘇聯第十一屆最高蘇維埃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戈爾巴喬夫當選聯盟院外交委員會主席⑦。這個職位十多年以來一直由蘇共理論家蘇斯洛夫 (M. A. Suslov) 所擔任，被視為領導階層的第二號人物、首席理論家、對外政策的主要制訂人之一。

註④ 關於這方面，可參見契爾年科的一篇報告與一篇論文：「黨意識形態與羣衆政治工作的迫切問題」〔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五日，第一至三頁；「迎接蘇共二十七大：關於蘇共理論、戰略、策略的若干重大問題」，〔共產黨人〕(Komunist)，一九八四年第十八期，第三至二十一頁。

註⑤ 「契爾年科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全會的報告」，〔真理報〕，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一頁。

註⑥ 鮑爾涅 (Eric Bourne)，「戈爾巴喬夫是蘇聯未來的人物」，〔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九頁。

註⑦ 〔真理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第四頁。

契爾年科死後，第二天戈爾巴喬夫馬上被推選為繼承人，可見事先已有安排。

戈爾巴喬夫於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生於斯塔夫羅波爾邊區（Savropolsky Kray）、克拉斯諾格瓦爾契區、普里伏爾村，出身農家。德蘇戰爭結束時他年方十五歲，在該邊區一個機械拖拉機站當機務員。一九五二年加入蘇聯共產黨，一九五五年莫斯科羅曼諾紹夫國家大學法律系畢業，一九六七年完成斯塔夫羅波爾農學院函授課程，取得農業經濟學的專門知識<sup>⑧</sup>。

從一九五五年起，戈爾巴喬夫開始從事共產黨青年團與共產黨工作：在斯塔夫羅波爾邊區，歷任共青團斯塔夫羅波爾市委會第一書記，共青團邊區委員會宣傳鼓動部副部長、第二書記、然後第一書記。一九六二年三月，他被調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邊區委員會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地區管理局黨組長，同年十二月升任該邊區委員會黨組織部部長。一九六六年九月被選拔為斯塔夫羅波爾市委會第一書記；一九六八年九月任斯塔夫羅波爾邊區委員會第二書記，一九七〇年四月升第一書記。

戈爾巴喬夫從一九七一年起，成為蘇共中央委員會委員，曾任蘇共第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及二十六次代表大會代表。一九七八年被選為中央書記；一九七九年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八〇年十月，升為正式委員。他曾被選為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次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第十與十一次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

戈爾巴喬夫在出生地斯塔夫羅波爾發跡。斯塔夫羅波爾邊區位於黑海東北岸之北高加索，其東北為乾燥草原，蘊藏豐富天然煤氣，出產小麥和向日葵等。令人驚奇的是，戈爾巴喬夫已經是從該邊區躋身中央位列顯貴的第三人了。第一名是蘇斯洛夫，他於一九八二年去世之前，在中央領導階層的權力僅次於總書記；另一名是庫拉科夫（F. D. Kulakov），他於一九七八年猝然逝世，未死之時，被視為布里茲涅夫最有可能的繼承人。蘇斯洛夫與庫拉科夫在斯塔夫羅波爾邊區先後擔任過第一書記。一九七八年戈爾巴喬夫調到中央接替庫拉科夫，主管農業。安德洛波夫執政時，派他主管全蘇經濟；至契爾年科時代，他又被派為意識形態與黨務的負責人。

從前述情形看，戈爾巴喬夫的爬升與蘇共其他領袖們大同小異，靠黨組織起家，祇是較別人快一點。在西方若干人士的眼中，戈爾巴喬夫是一個具有高度智慧的人，態度和藹親切，易於與人相處。他的魅力、幽默感和從容氣度是蘇共首腦中少見的。他出國訪問時，特別是一九八四年底訪問英國期間，帶給人一個新的形象。今年二月底，俄羅斯聯邦共和國選舉最高蘇維埃代表投票時，他在各國記者面前，談笑風生。

戈爾巴喬夫談吐委婉、言語中倡議實事求是，重視理性；而且表示，在政治中與外交中必須有合理的妥協與折衷<sup>⑨</sup>。同時，

註⑧ 關於戈爾巴喬夫的經歷，係以蘇共所公佈者為主，參見《真理報》，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頁。

註⑨ 戈爾巴喬夫，「在英國議會的講話」，《真理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第四頁。

他在三月十二日的就職講詞中並未強調意識形態。因此，不少人以為他是一個務實派領袖。其實，這一點並不完全正確。戈爾巴喬夫在接任總書記之前，負責思想工作與思想教育，所以他不可能、也不會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放鬆。閱讀他於去年十二月在英國的講辭，固然會覺得他是一個可以理喻的人；但是，瀏覽一下他於一九八三年底在葡萄牙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的談話<sup>⑩</sup>，就會體會到，他是一個典型的共產黨人，在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毫不讓步。因此，可以斷定，他確實是一個善於隨機應變的人，知道對什麼人該講什麼話，在什麼地方該說什麼話。一言以蔽之：他言語溫和，立場堅定。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戈爾巴喬夫在一次「全蘇科學實踐會議」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意識形態工作的講詞<sup>⑪</sup>。從這篇談話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思想傾向。茲歸納數點如下：(一)他認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含有真正的、社會進步的理想；(二)資本主義面臨總危機，它必須借助戰爭或恐怖活動，以阻止致命時刻的來臨；同時，資本主義加強了意識形態活動，擴大宣傳，對社會主義進行心理作戰；(三)戈爾巴喬夫強調，在評估當前事件與現象時應堅持黨的原則與階級立場，對怪異的觀點應提高政治警覺及不妥協精神；(四)意識形態工作需要含有攻擊性，所謂攻擊性就是：不僅要揭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神話」，而且要宣揚社會主義的理論與成就」，和「宣傳蘇共愛好和平的國際政策」；(五)蘇共的一貫方針是，「團結國際共產與工人運動」；(六)基於現代意識形態鬥爭的尖銳性與複雜性，必須改良國內與國外的反宣傳工作，進一步使宣傳內容深刻化，更加有隨機應變的能力。

以上是蘇共新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所持的基本立場，也是他在思想工作上的幾點基本方針。由此可以看出，戈爾巴喬夫的基本立場像所有其他蘇共領袖一樣：國際緊張關係可以緩和、經濟可以合作、軍備競賽可以限制，但是，意識形態鬥爭決不終止、決不妥協。

## 蘇共未來權力結構

蘇聯現行憲法明文規定，蘇共是蘇聯社會的領導與指導力量，是政治制度、國家與社會組織的核心；同時規定，蘇共負責決定蘇聯社會的總遠景，制訂對內對外政策路線，領導人民進行各種活動<sup>⑫</sup>。蘇共平時最高領導機關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其成員最多時有十五名，最少時為九名<sup>⑬</sup>，他們都是蘇聯黨政最高領袖。政治局的功能與西方的內閣相似，決定國家的重大政策；每週開

<sup>註⑩</sup> 「戈爾巴喬夫在葡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詞」，《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第四頁。

<sup>註⑪</sup> 戈爾巴喬夫，「人民之主動的創造力」，《真理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二頁。

<sup>註⑫</sup> 「蘇聯一九七七年憲法」第六條，〔五部憲法〕（*Five Constitutions*）（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79），第一四九頁。

<sup>註⑬</sup> 蘇共政治局（一度稱「主席團」），一九四一年有八名成員，一九七一年時有十五名。

會一次（通常在星期四），決議案採取全體一致同意的方式通過，不進行公開辯論或批評，這是與西方內閣最大的不同之處。政治局沒有自己的辦公處，一切事務由書記處總務部辦理。政治局會議時，沒有明文規定應由何人擔任主席，自赫魯雪夫任總書記之後，通常由總書記擔任政治局會議的主席。基於這些以及其他因素，蘇共總書記自然成爲蘇共的首腦，蘇聯的政治領袖。蘇共黨章未明確規定或賦予總書記以特別權利，因此其權力往往視個人的經營而定。蘇共領袖權力轉移，往往分爲兩個階段，一是權位的獲得，一是權力的鞏固。戈爾巴喬夫繼承權力的第一階段業已完成，往後將開始鞏固權力的過程。這個過程歷時的久暫，很難預測。赫魯雪夫經過了五年，已把大權集於一身；而布里茲涅夫却花了將近十三年的時間<sup>⑭</sup>。在個人權力沒有集中之前，政治局的領導通常被稱之爲「集體領導」。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蘇共前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死後，安德洛波夫繼任其職；十五個月後，他也死於任所，由契爾年科承乏。他們兩人執政期間過短，且體弱多病，以致形成一個名副其實的「集體領導」。戈爾巴喬夫在就任總書記的致詞中，雖沒有強調「集體領導」，但也曾兩度提到政治局活動的集體性質<sup>⑮</sup>。目前，蘇共政治局委員除了戈爾巴喬夫外，尚有九名，年齡皆比他大。如果，這個情形不改變，他的權力很難擴展。茲將其餘九名政治局委員及其簡單背景條列於後：

一、阿里耶夫 (G. A. Aliev)，六十二歲，阿塞拜疆人，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由國內安全機關竄升。

二、格里辛 (V. V. Grishin)，七十一歲，俄羅斯人，共黨莫斯科市委會第一書記，由地方黨組織起家。

三、葛羅米科 (A. A. Gromyko)，七十六歲，俄羅斯人，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長，職業外交官，從事外交工作已四十六年，任外交部長已二十八年。

四、庫納耶夫 (D. A. Kunaev)，七十三歲，哈薩克人，哈薩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曾從事科技研究學術活動、農業墾荒及工業改組等工作。

五、羅曼諾夫 (G. V. Romanov)，六十一歲，俄羅斯人，蘇共中央書記，在列寧格勒省從事黨工多年，通曉工業化、國防工業及黨管理工作。

六、謝爾比茨基 (V. V. Shcherbitsky)，六十七歲，烏克蘭人，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工業專家，但以黨務工作爬居高位。

七、所羅門柴夫 (M. S. Solomentsev)，七十二歲，俄羅斯人，黨督察委員會主席，黨工出身，擅長經濟、重工業及軍備工業。

八、契浩諾夫 (N. A. Tikhonov)，八十歲，烏克蘭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工業專家，由經濟與工業管理升居政府首長之職。

九、伏羅特涅科夫 (V. I. Vorotnikov)，五十九歲，俄羅斯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擅長工業管理，由蘇聯共青團及黨務工作上升，目前爲契浩諾夫的可能繼承人。

註⑭ 勒文哈特 (John Löwenhardt)，〔蘇聯政治局〕 (*The Soviet Polit Bureau*)，英譯克拉克 (D. Clark)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第四八—五〇頁。

註⑮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的講詞，〔真理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第三頁。

政治局現有成員十名，平均六十七歲，存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老化問題，一是成員增補問題。戈爾巴喬夫可以在今夏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增補成員，也可等到今年底或明年初召開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時，引進新人。蘇共新任總書記未來改組政治局有兩種方式，一是以較年輕者替代年老者，並略增人數；一是年老者不作重大更動，但大幅增加新成員。如果拿蘇共以往史例為判斷依據，則後一方式可能性較大。此外，一些較年輕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可能獲得升遷的機會。

無論戈爾巴喬夫用什麼方式改組政治局，無論未來政治局人員有多少，目前的「集體領導」形式不會很快發生劇變。他在近期內不可能隨自己的好惡安排人事，因此這種領導形式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維持下去。蘇共目前的集體領導有幾個特點：（一）不易產生權力真空；（二）權力轉移時，鬭爭不甚劇烈；（三）各委員各有負責領域，職權劃分明確，而重大議案則由全體議決；（四）不易通過激變政策。蘇共在理論上與言論上皆有意維持此一領導形式。

此外，布里茲涅夫晚年、安德洛波夫及契爾年科皆以蘇共總書記身份兼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及國防委員會主席；如果這不是一個制度，至少已形成一個慣例。因此，不久戈爾巴喬夫亦可能兼領這兩個職位。

### 莫斯科政策的趨向

蘇共新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其首次講詞中說，蘇共二十六大及其後歷次中央全會所確定的戰略路線是不會變更的<sup>⑯</sup>。蘇共領袖的變更對蘇聯未來政策的基本方針不會發生重大影響，但在政策重點、優先程序、執行方式與領導作風方面將會有所不同。以下就戈爾巴喬夫的講詞<sup>⑰</sup>，檢視他在黨務、內政與外交方面的見解，以窺測蘇共未來政策趨向的一斑。

在黨工方面，戈爾巴喬夫認為，當前的任務是進一步強化黨、提高黨的組織與領導角色；始終不渝地執行黨的政策，使黨能夠團結人民、動員力量。蘇共將全力發展青年的創造性與主動精神，改善他們勞動與生活的條件。改進思想工作方針，加強紀律、法制、秩序，改善幹部政策等。目前蘇共正廣泛為召開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展開籌備工作。代表大會五年一次，是蘇共理論上最高權力機關。在這次大會上，除了選舉中央委員作為黨最高領導機關，批准下一個五年社會與經濟發展計劃等經常議程外，尚要通過新黨綱、修改黨章。按照蘇共的界定，黨綱是黨的「基本理論文件」，包含黨的最後目標與某一個歷史階段內最重要的

<sup>註⑯</sup> 〔真理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第三頁。

<sup>註⑰</sup> 戈爾巴喬夫最近所發表的重要報告包括：「在英國議會的講詞」，〔消息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第四頁；「在全蘇科學實踐會議上的報告：人民之生動的創造力」，〔真理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二頁；「選前大會上的講詞：團結一致的方針」，〔真理報〕，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二頁，「在三月十一日中央全會上的講詞」，〔真理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第三頁。

任務<sup>⑯</sup>。至目前為止，蘇共先後公布過三個綱領，現行的第三黨綱領是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

像以往歷任蘇共領袖一樣，戈爾巴喬夫非常重視經濟問題。他認為，蘇聯的戰略路線是，加速社會經濟的發展，完善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改革生產的物質技術基礎，完善社會關係體系，特別是經濟關係，改善生活與勞動的物質條件及精神面貌<sup>⑰</sup>。但是，戈爾巴喬夫要加速經濟發展，必須在相當程度上克服經濟領域內若干現存的難題。這些難題包括：（一）農業長期不振；（二）勞動人口增長率過低；（三）勞動生產力不易提高；（四）官僚習氣積重難返；（五）軍事負擔過重；（六）勞動紀律鬆弛。

戈爾巴喬夫為克服蘇聯經濟困難，可能從三方面着手。第一，貫徹實行既定措施。去年底，蘇聯在一九八五年社會與經濟發展計劃中，曾確定了五項重要措施：（一）節約使用物質資源；（二）合理運用勞動力；（三）不斷改善產品品質；（四）廣泛應用科技成就；（五）全面完善管理<sup>⑲</sup>。第二，加強並擴大安德洛波夫所發動的各項改革措施。這些措施在契爾年科當政的十三個月中，不是停擺，就是執行不力。戈爾巴喬夫原是安德洛波夫改革計劃的主要設計人之一，他上臺之後，自然會大力推動這項改革運動<sup>⑳</sup>。第三，作出較極端的改革，諸如決策分權，提高工人物質刺激、和削減軍費。這些改革似乎可以使蘇聯經濟有大幅度的改善。但是，任何極端改革將招致黨內強硬派、政府官僚及軍事領袖們的反對<sup>㉑</sup>。因此，戈爾巴喬夫在個人權力未十分鞏固之前，縱有大施改革之心，也難為所欲為。

在國內政治上，戈爾巴喬夫認為蘇共當前的根本任務是，「進一步完善與發展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自治體系」。這一個任務是多面向的，近兩年來蘇共已制訂了一些措施<sup>㉒</sup>。這裏所指的就是，提升各級「蘇維埃」的作用，加強職工會、共青團、人民檢查機關、「勞動集體」的活動。按照蘇共新任總書記的看法，若要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必須提高蘇聯人民的社會意識，有效

註<sup>⑯</sup> 〔蘇聯大百科全書〕（莫斯科，一九七五年），第二十卷第二十一至二十四頁。

註<sup>⑰</sup> 〔真理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第三頁。

註<sup>⑲</sup> 巴依巴科夫（N.K. Baybakov），「關於蘇聯一九八五年社會和經濟發展計劃及一九八四年計劃實施的報告」，〔消息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一至三頁；貝立克（Yu. A. Belik），「五年計劃的完成年」，〔經濟報〕（*Ekonomscheskaya Gazeta*），一九八五年元月，第一期，第五至六頁。

註<sup>㉑</sup> 伊阿姆斯（J. Iams），「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激起擔心與欣喜」，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九日，第三頁。

註<sup>㉒</sup> 「戈爾巴喬夫的克里姆林宮：它的現況？」〔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六頁。

註<sup>㉓</sup> 最主要者是，一九八三年六月全會所通過的「蘇聯關於勞動集體及提高其管理企業、機構及組織權力的法律」（簡稱：「勞動集體法」），原文載於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真理報〕。

地教育工人、集體農場農民及知識分子，使他們參與各種問題的解決及各個缺點的克服。他強調，今後「一切意識形態活動的最重要任務是，加強紀律，培育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他表示，在這方面蘇共將採取斷然措施，以便進一步整頓秩序、消除怪異現象及危及社會利益的不良企圖、加強社會主義法紀<sup>20</sup>。

戈爾巴喬夫成爲克宮新主人後，在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上，不會作明顯轉變，但在作風上可能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以下根據他就任總書記前後所發表的言論，歸納出蘇聯對外關係的一些可能傾向<sup>21</sup>：

- (一) 他強調「外交理性」、反對戰爭，故今後蘇聯外交政策將較具彈性；
- (二) 他不容許西方獲取軍事優勢，故軍備競賽的速度可能緩和，但不會終止；
- (三) 他主張在政治與外交上必須有合理的妥協與折衷，因此蘇聯今後可能與西方國家達成較多的協議；
- (四) 他願與美國繼續限武談判，但堅持美國必須調整立場，才有可能達成協議；
- (五) 他重視對歐洲的關係，故將加強對西歐的活動，並在新的基礎上團結東歐集團；
- (六) 他強調政治與貿易的相互關係，故今後將擴大貿易關係以改善政治關係；在這個條件下，蘇聯與日本關係可能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
- (七) 他重申對「民族解放」的支持與同情，故將繼續援助第三世界，但將避免作出刺激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措施與活動，並積極經營中東；
- (八) 他表示要認真改善同中共的關係，因此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速度可能略快，但在短期內不會有所突破。

## 結論

戈爾巴喬夫繼承蘇共總書記，是蘇共權力過渡的底定，是蘇聯政治史上另一時代的開始。在未來幾年之內，蘇聯中、上領導階層將改變面目，目前仍舊在位的老人將一一消失。

在戈爾巴喬夫尚未集大權於一身之時，蘇共上層將維持「集體領導」。在集體領導下，政策的劇變極不可能。因此，政策的延續性將是蘇共未來數年內政治上的特徵之一。

年內召開的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無論在中央領導階層上或蘇共政策方針上都可能帶來較大、較多的轉變。

<sup>註20</sup> 註20 「眞理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第三頁。

<sup>註21</sup> 同註20，尤應注意他「在英國議會的講詞」，「消息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第四頁。